

社交媒体中的健康谣言对老年人健康决策的影响与干预机制

史路遥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生态文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6年4月19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22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30日

摘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与媒介数字化双重进程的加速，社交媒体已成为老年群体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场域，但同时也成为健康谣言滋生与扩散的温床。农村及城市老年人在健康信息甄别、数字素养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易被圈层内流传的虚假养生内容误导，进而干扰其健康决策。本文立足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背景，运用社会信任理论与社会支持理论的基本思想，将老年人视为社会网络的节点，将亲情、邻里、社区等熟人关系视为连接节点的边，系统探讨社交媒体健康谣言对老年人健康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健康谣言借助圈层化封闭传播与熟人信任背书，不仅扭曲了老年人的健康认知，干扰其就医选择，更导致其社会支持网络的功能退化与信任结构的“内卷化”。并从政府统筹、平台监管、社会供给、家庭代际支持与个人赋能五个维度提出了系统性的协同干预策略，最终目标是通过这些努力，有效阻断健康谣言的社会传播链，提升老年人在数字时代的健康决策能力，守护其身心健康与合法权益。

关键词

社交媒体，健康谣言，老年人，干预机制

The Impact of Health Rumors in Social Media on Health Decision-Making of Older Adults and Intervention Mechanisms

Luyao Sh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Schoo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April 19, 2026; accepted: July 22, 2026; published: July 30, 2026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media digitalization, social media have become a crucial arena for the elderly to access health information, yet they have also fostered the proliferation of health rumors. Elderly people in both rural and urban areas are relatively disadvantaged in terms of health information discernment and digital literacy, making them vulnerable to misleading false health content circulating within their closed social circles, which in turn interferes with their health decision-making. Grounded in the national strategic context of actively responding to population aging, this study draws on social trust theory and social support theory, conceptualizing the elderly as nodes in a social network and their kinship, neighborhood, and community relationships as edges connecting these nodes,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social media health rumors influence the health decision-making of the elderl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facilitated by closed-circle dissemination and trust endorsement within acquaintance networks, health rumors not only distort the elderly's health perceptions and interfere with their medical choices but also lead to functional degradation of their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nd the "involution" of trust structures. Furthermore, a systematic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intervention strategy is proposed from five dimensions: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platform regulation, social supply,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individual empowerment.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effectively disrupt the social transmission chain of health rumors, enhance the health decision-making capacity of the elderly in the digital age, and safeguard their physical, mental, and financial well-being.

Keywords

Social Media, Health Rumors, Elderly, Intervention Mechan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与媒介数字化全面渗透的双重背景下，社交媒体已成为老年群体获取健康信息、维系社交关系的重要场域，但同时也成为虚假健康信息滋生与扩散的温床。大量披着“养生”“偏方”外衣的健康谣言在家族群、老友群等私密圈层中流通，直接干预老年人的健康认知与就医选择，已成为数字时代老龄社会治理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难题。

近年来，围绕老年人健康信息行为与社交媒体谣言传播的研究持续升温。在谣言传播现状层面，雷霞、李云帆指出老年群体在谣言感知与传播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认知不协调，他们普遍自认为具备足够的谣言判断力，却在现实分享行为中频繁轻信与传播谣言[1]。在易感成因方面，王素芳、周禹涵通过问卷调查及准实验法发现，老年人健康信息甄别能力偏低，特别是在信息内容甄别上，学习伪健康信息特征可以有效提高老年人的甄别能力[2]。庄曦以微信平台为例，研究发现老年群体的健康信息接触与鉴别对熟人社交网络依赖程度较高，社交依赖容易引发信息认知的内卷化[3]。陈娟等研究发现，中国老年人往往会向“强关系”群体分享养生保健和特定病况信息，还会出于消除不确定性的目的分享信息以寻求他人把关[4]。在干预层面，吕小康等从信息生命周期视角提出了健康谣言的分阶段干预策略[5]。

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老年人在数字社会中所面临的深刻结构性困境。一方面，退休之后老年人的社会交往范围逐渐收缩，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依赖于亲戚、邻居等熟人关系。老年人通过熟人网络获

取信息，虽然能够带来情感上的慰藉，却也容易导致信息源的单一化和重复化，使得外部科学知识难以进入他们的认知世界。另一方面，在数字时代，传统的“长老权力”正受到“时势权力”的冲击，代际关系发生深刻重构，老年人在家庭中的信息权威地位有所动摇[6]。社会资本的流失使得老年人在面对健康问题更加孤立无援，社交媒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替代性支持的角色，但由于缺乏专业健康内容的供给，反而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些社会层面的因素，为我们理解老年人为何容易受健康谣言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

本研究在方法上采用参与式观察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研究者以普通成员的身份，进入到多个老年人日常使用的微信群组中，这些群组包括家族群、养生爱好群以及社区邻里群等不同类型。通过较长时间的持续观察，研究者着重记录了健康类谣言在这些群组里是如何被分享和讨论的，群成员之间又是如何回应、如何看待这些信息的。研究的关注点不在于谣言的传播速度或范围，而是力图从社会互动的层面，去理解谣言如何在熟人之间“流动”起来，以及这种流动背后反映出老年人怎样的日常交往逻辑和信息信任模式。

研究聚焦以下问题：第一，在老年人日常交流的微信群聊中，健康谣言通常以什么样的话语方式出现，又是如何在熟人之间流转开来的？第二，老年人是在什么样的日常社交场景里接触到这些信息的，他们为什么会倾向于相信并接受这些说法？第三，这些信息对老年人看待自身健康的方式和实际的就医用药选择带来了哪些改变？第四，面对这一问题，如何在政府、社区、平台、家庭和老年人自身之间建立起一套多方参与、协同有效的应对机制？本研究希望通过回答这些问题，为更好地理解数字时代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健康风险以及相关的社会治理议题提供一些观察和思考。

2. 社交媒体健康谣言的特征与社会建构

2.1. 圈层化封闭传播与信任背书

在社交媒体中，老年人的社交圈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熟人属性。健康谣言主要在家族群、老友群等私密圈层内流转，传播者往往是亲属、老友或同龄网友。老年人对健康信息的信任呈现出明显的圈层化特征——他们对熟人分享的内容信任度远高于对专业医疗人员和大众媒体的信任。这种信任并非后天建构的产物，而是根植于熟人社会长期形成的情感纽带。从社会信任理论的角度看，信任的分布并非均匀地覆盖在所有社会关系之上，而是遵循着一种由亲至疏、由内而外的差序结构——人们在面对亲近关系时倾向于给予较高程度的信任，而在面对陌生对象时则普遍表现出审慎与提防[7]。这种“内外有别”的信任逻辑，使得老年人在面对熟人圈层内分享的健康信息时，其警惕性天然地低于面对公共平台信息时的状态。

与此同时，老年人在熟人圈内获取健康信息的成本极低，往往只需几句闲聊或一条转发即可完成信息交换，而向专业医疗机构咨询则意味着更高的时间和精力投入[8]。在这种低成本、高信任的熟人社交模式下，老年人面对健康谣言时的警惕性显著降低。比起公共平台发布的信息，他们更愿意相信圈层内亲友的分享，而谣言中常见的“专家认证”“祖传秘方”“身边人亲测有效”等表述，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辨别意愿，最终促成了谣言在熟人圈层中的快速扩散。

2.2. 内容设计贴合老年认知与健康需求

从 2018 年微信中传播范围较广的谣言可以看出，健康养生与食品安全在其中占有较大比例。其中，有近四成的谣言都与健康养生有关，是谣言频发区域。在食品安全类谣言中，“塑料紫菜”“榴槤与牛奶一起吃会中毒”“塑料假大米”位居前列；在医疗健康类谣言中，关于致癌内容的占比最高[9]。这些

谣言之所以传播迅速，关键在于它们精准触及了公众最敏感、最关切的议题——食品与健康。

对于老年群体而言，这一机制尤为突出。社交媒体上的健康谣言高度契合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心理需求，内容多围绕慢性病调理、养生保健、疾病预防、抗衰老等老年人重点关注的领域展开。谣言的语言表达通常通俗易懂，辅以生活化的案例和情绪化的表述，降低了老年人的理解门槛。

2.3. 轻量化传播形式适应老年人媒介习惯

当前，网络健康谣言早已不是单一的文字形态，而是融合了视频、图片、语音等多种媒介形式。新奇的内容搭配逼真的细节描述，再以“有图有真相”的方式进行包装，使谣言显得更加可信，也更具有说服力[10]。相较于传统以文字为主的谣言，这类多媒体谣言在感官冲击力和情感调动能力上都有了显著提升，老年人在面对声画并茂的内容时，更容易放下戒备心理，将其当作真实可信的信息加以接受。

具体来看，短视频类健康谣言在这一趋势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们常常借助真人出镜演示、情景化剧情演绎，或是让演员穿上白大褂冒充“权威专家”进行讲解，以此传递虚假的健康知识。这类视频往往配以舒缓的背景音乐和醒目的字幕提示，营造出一种亲切可信的观看氛围，使老年人更容易产生代入感和信任感。图文类谣言则针对老年人视力退化的生理特点进行了专门设计，多采用超大号字体排版，搭配高饱和度的鲜艳配色，并在关键语句处加以重点标注，从视觉层面降低老年人的阅读门槛。这种形式上的“轻量化”进一步降低了老年人甄别信息的门槛，使谣言的感染力和传播力大大增强。

3. 老年人易感社交媒体健康谣言的社会结构性成因

3.1. 数字健康素养不足，信息甄别能力弱

老年群体普遍缺乏系统的健康知识 with 媒介素养教育，数字健康素养整体偏低，难以有效辨别健康信息的真伪。尤其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他们对社交媒体了解较少，网络媒介素养较低，正确认知、判断、筛选网络信息的能力较弱。因此面对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真假难辨的网络陷阱，农村老年人容易上当受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给其生活带来安全困扰[11]。这类老年人大多没有掌握网络信息验证的方法，对社交媒体上看似“科学”“专业”的虚假信息缺乏分辨能力，加之获取健康信息的渠道十分单一，过度依赖社交媒体，因此极易被谣言内容误导。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不足，不仅仅是操作技能不够的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不同代际、不同阶层之间掌握的文化资源存在明显差距。年轻一代通过学校教育和日常工作，自然地积累了使用数字设备的经验和能力，而老年群体，特别是那些教育程度不高、退休前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老人，他们的知识储备更多来自传统生活经验，跟数字化的信息环境之间本来就有不小的距离。数字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原有的社会差距，老年人在其中受到文化层面的排斥，数字素养的欠缺也因此更加突出[12]。这种代际之间在文化资源上的落差，使得老年人在获取和判断网络健康信息时处于比较被动的位置，很难建立起有效的自我辨别和防护能力。

3.2. 情感需求与健康诉求双重驱动

老年群体退休后社交范围缩小，孤独感、衰老感与日俱增，对身体健康的关注度大幅提升。有着强烈的健康保障与情感陪伴需求。一方面，大部分老年人主要靠自身摸索学习使用新媒体，受知识层级和思想观念的限制，学习过程中困难重重；另一方面，许多老年人没有子女陪伴在身边，精神孤独空虚，缺乏代际支持[13]。在这种背景下，社交媒体健康谣言恰好同时满足了老年人的双重需求：一是迎合其健康诉求，提供看似可行的解决方案；二是通过熟人圈层传播，满足其社交互动与情感联结的需求。双重驱动下，老年人更愿意接受并相信谣言信息，甚至主动参与传播。

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个体的身心健康水平与社会支持网络的规模与质量密切相关。对老年人而言,家庭支持居于核心地位,邻里、朋友等非正式网络构成重要补充,社区与机构则提供正式支持[14]。然而,随着家庭结构变迁与社会流动加剧,老年人可获得的社会支持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呈现下降趋势。社交媒体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线下交往的不足,但这种“虚拟支持”的实际效果高度依赖网络内部的信息健康程度。当微信群、养生群逐渐成为老年人获取情感认同与归属感的重要场域时,群内流传的谣言便借由情感共鸣绕过了他们的信息审查机制。换言之,老年人对健康谣言的易感性不仅源于认知层面的辨别能力不足,更深层地反映了社会支持网络功能弱化后的一种“替代性满足”——他们接受的往往不是谣言的具体内容,而是谣言传播过程中所裹挟的社会关系与情感温度。

3.3. 权威健康信息供给不足, 技术适配性欠缺

当前针对老年群体的权威健康信息首先面临的是供给数量不足的问题。与社交媒体上海量的养生内容相比,由专业机构发布的、专门面向老年人的健康科普信息在体量上明显偏少,难以形成有效的信息对冲。在供给有限的基础上,既有的权威健康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又普遍存在技术适配性不足的困境。多数内容仍以专业文字和学术表述呈现,语言晦涩且篇幅冗长,没有进行通俗化的转化处理,很少采用短视频、语音、漫画、方言讲解等老年人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即便部分健康信息在内容层面完成了适老化改造,承载这些信息的智能终端本身也构成了一道隐形门槛。智能手机不断迭代的系统和日益繁杂的操作界面,不仅削弱了老年人自主获取信息的信心,也抬高了子女进行数字反哺的难度[15]。

3.4. 平台监管缺位, 社会责任履行不足

社交媒体平台针对健康类信息的审核监管存在明显漏洞。一方面,对虚假健康信息、违规养生营销内容的筛查与清理不及时,算法审核难以识别经过包装的谣言文本,人工复核资源投入不足;另一方面,老年圈层大多依赖私密的微信群、QQ群等社群进行信息分享,对于这类封闭场景,平台监管的难度很大,谣言容易在“熟人信任”的掩护下隐蔽传播。此外,平台现有的辟谣机制并未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使用特点,辟谣信息多采用文字链接或蓝底白字的专业界面,字号偏小、操作复杂,老年人不易发现或点击阅读。辟谣信息传播力度不足,无法有效触达并提醒老年用户。

从社会治理角度看,平台监管的缺位不单是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它更关系到数字平台作为准公共机构应当如何定位自身的社会责任。数字平台已经深度嵌入社会结构的运行过程,其算法设计、内容审核机制以及用户协议等都在事实上发挥着规范社会行为的效应。然而当前一些平台在商业利益驱动下始终将资本盈利视为终极目标[16],这导致它们更倾向于用高互动内容来维系老年用户的在线时长,即便这些内容多为缺乏科学依据的养生信息,平台也往往疏于审核与干预。

4. 社交媒体健康谣言对老年人健康决策的多重影响

4.1. 扭曲健康认知, 形成错误健康观念

健康谣言传播的虚假医学知识、错误养生理念,会逐步侵蚀老年人原有的科学健康认知,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认知替代效应。部分谣言宣扬“西药伤身、偏方根治”“保健品可替代药物治疗”“医院检查都是骗钱”等错误观点,反复灌输之下,老年人容易对正规医学治疗产生质疑甚至抵触,转而信奉违背科学常识的“养生哲学”。长期接触此类谣言,老年人的健康认知体系会逐渐固化,形成一套自洽但错误的健康信念。这种固化的错误认知一旦形成,便难以通过简单的辟谣信息加以纠正,老年人会本能地排斥专业医疗建议,为自己的健康埋下严重隐患。

4.2. 干扰就医选择，延误疾病诊疗时机

受健康谣言误导，部分老年人在出现身体不适时，不再将正规医院作为首选，而是轻信谣言中的偏方，自行诊断、盲目调理，拒绝接受专业治疗。一些谣言鼓吹某种食物或保健品可以替代正规医疗，夸大药物的副作用，贬低标准化治疗方案，导致老年人延误关键治疗窗口。尤其对于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因听信“长期服药有害”“停药后可自愈”等虚假信息，擅自停药或更改治疗方案，不仅使病情急剧加重、错过黄金诊疗时间，甚至直接危及生命。当前，因健康谣言干扰就医决策所引发的健康危机在老年群体中已屡见不鲜，亟需引起重视。

4.3. 催生非理性健康消费，造成财产损失

大量健康谣言背后往往绑定着保健品、养生器械、虚假医疗服务等商业营销，谣言充当营销引流工具，诱导老年人进行非理性健康消费。商家通过谣言夸大产品功效，将普通食品、器械包装成“治病神药”“养生神器”，利用老年人对健康的渴求与对熟人分享的信任，促使老年人高价购买无用甚至有害的产品，这不仅造成老年人财产损失，更可能因滥用不合格产品而损害身体健康。此类谣言往往披着“亲历者讲述”“老中医秘方”等外衣，通过不断重复与情感渲染，持续加深老年人的健康焦虑与认知偏差。

4.4. 加剧健康焦虑，影响老年心理健康

社交媒体健康谣言常常通过夸大疾病风险和制造健康恐慌来博取关注与转发。这些谣言反复向老年人推送极端化且负面化的信息。长期接触此类内容，老年人的健康焦虑与恐慌情绪被不断放大。他们会逐渐陷入一种过度警觉的心理状态，表现出明显的疑病倾向。稍有身体不适便联想到绝症，对日常饮食和生活起居充满不安与恐惧。这种持续的健康焦虑容易引发一系列身心问题，包括失眠、食欲下降、情绪烦躁以及兴趣减退。严重时，还可能发展为焦虑症或抑郁状态。此外，部分谣言还会传播“子女不关心才会让老人得病”这类内容，从而进一步加重老年人的孤独感和自责情绪。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及其心理健康状态。

5. 应对社交媒体健康谣言的多元协同干预机制

5.1. 强化政府统筹监管与服务供给，构建制度保障体系

政府需发挥主导作用，将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纳入政策重点范畴，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17]。一方面，要完善健康信息传播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界定健康谣言的认定标准与处罚措施，加大对制造和传播谣言行为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推动卫健、网信、公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开展针对老年健康谣言的专项整治行动，形成常态化的治理机制。同时，将老年人数字素养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通过财政支持和政策引导，保障老年大学、社区等机构持续开展数字助老项目。通过制度化的保障与统筹协调，政府能够为其他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提供坚实基础。

5.2. 强化平台主体责任，完善全流程谣言监管体系

社交媒体平台作为健康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必须切实落实信息监管的主体责任，建立针对老年健康内容的专项审核机制。平台应安排专业人员结合技术手段，对涉及老年人健康的图文、视频、音频等内容进行重点筛查，利用关键词过滤、图像识别以及用户举报等多元技术精准识别并快速清理虚假健康谣言与违规营销信息。针对老年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私密社群，平台需加强与社群管理员的联动，建立便捷的违规信息上报通道，提高封闭场景中的监管效能。同时，平台应着力优化适老化辟谣机制，在老年

用户高频访问的页面设置醒目的弹窗提醒，推送权威辟谣内容，并为老年用户开通专属辟谣信息推送服务，主动将已证实的谣言及其真相说明发送至用户的消息列表或首页推荐位。

5.3.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优化权威健康信息供给及数字教育

医疗卫生机构与主流媒体应进一步加大面向老年群体的健康科普供给力度，着力打造适老化的健康科普内容。具体而言，需将专业医学知识转化为老年人易于接受的传播形态，例如制作简短的科普视频、录制语音讲解、绘制图文并茂的漫画或信息长图，实现内容的轻量化与通俗化改造。这些内容应精准投放到老年用户高频使用的社交平台，如微信群、微信朋友圈、抖音、快手等，确保科学信息能够主动进入老年人的信息视野，形成常态化推送机制。同时，可结合社区宣传栏、老年活动中心等线下场景进行二次传播，线上线下协同发力，扩大科普的覆盖面。此外，社会企业也应当积极参与，开发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数字健康产品，如大字版健康资讯 App、智能语音健康助手等，同时提供简明易懂的操作指南和便捷的售后服务，切实降低老年人学习数字技术的门槛[18]。社区应落实老年人数字技术教育政策，联合非政府组织与高校志愿团队开展数字科普、开设手机课堂，并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数字互助团队，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19]。

5.4. 发挥家庭代际支持作用，筑牢日常防护的第一道防线

家庭是老年人接触社交媒体最直接的社会环境，子女与晚辈的数字反哺对降低老年人遭受信息误导和健康谣言的风险具有显著作用。研究发现，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越多，与老年人联系越频繁，老年人在数字世界中的弱势地位就越能得到有效缓解，遭遇谣言欺骗的可能性也会越低[20]。因此家庭成员应主动承担日常防护责任。他们可以定期关注老年人浏览的健康信息内容，耐心帮助长辈辨别谣言真伪，及时纠正错误认知。同时，子女可以为老年人设置手机中的权威健康信息来源，例如关注官方卫健公众号，取消推送可疑账号，并教会老年人使用举报或屏蔽功能。通过亲情陪伴和经济支持以及日常引导，家庭能够在源头上减少老年人接触谣言的机会，成为抵御健康谣言最温暖也最有效的一道防线。

5.5. 激发老年人主动学习意识，提升自我信息防护能力

老年人自身应树立主动学习的意识，积极适应数字时代的变化。可以通过参加社区或老年大学组织的数字技能培训，主动学习智能手机操作、信息搜索以及权威健康平台的使用方法。在日常生活中，老年人要养成对社交媒体健康信息进行核实的习惯，例如查看信息来源是否可靠、是否有官方医疗机构背书，不轻信标题夸张或承诺疗效的内容。遇到不确定的健康信息时，可以主动向子女、亲友或社区医生求证，避免盲目相信和转发。同时，老年人应学会使用简单的辟谣工具，如微信辟谣助手、国家卫健委官方平台等，逐步建立自己的权威信息获取渠道。通过持续学习和实践，老年人能够不断增强对健康谣言的识别能力，从自身筑牢抵御虚假信息的第一道屏障。

6. 结语

社交媒体健康谣言对老年人健康决策的干扰，是数字时代老龄健康传播与老年权益保障面临的重要问题，其背后折射出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短板、权威信息供给失衡、平台监管不完善等多重现实问题。老年群体作为健康谣言的易感人群，其健康决策的科学性直接关系到晚年生活质量与生命健康，破解这一难题，不能仅依靠单一主体发力，而是要从政府、平台、社会、家庭和个人等维度发力，构建全方位、精准化的谣言干预机制。未来，在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的背景下，需进一步聚焦老年群体的媒介使用与健康信息需求，打造更具适配性的健康传播体系，阻断健康谣言传播路径，守护老年群体健康权益，让老年人在数字时代更好地享受科学健康信息服务，实现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

参考文献

- [1] 雷霞, 李云帆. 老年群体的谣言认知不协调及其纠偏机制[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3, 45(3): 159-168.
- [2] 王素芳, 周禹涵. 老年人社交媒体健康信息甄别能力及其提升影响因素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22, 66(24): 14-29.
- [3] 庄曦. 城市老年群体微信健康信息的接触与鉴别研究[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6): 112-122.
- [4] 陈娟, 甘凌博. 向信息寻求关系——基于微信的老年人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研究[J]. 新闻记者, 2021(9): 10-24.
- [5] 吕小康, 刘欣, 杨婷婷, 等. 健康谣言的干预策略: 基于信息生命周期的视角[J]. 心理科学进展, 2024, 32(4): 664-676.
- [6] 杨菊华. 长老权力与时势权力的消长: 数字时代的代际关系[J]. 学术月刊, 2022, 54(11): 121-133.
- [7] 胡彬彬, 齐昕. 居住格局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分析——基于贵州省的调查数据[J].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 24(3): 96-105.
- [8] 包婧祺, 郑骄阳. 老年群体“意见领袖”参与科学传播的优势与风险研究[J]. 新闻研究导刊, 2025, 16(21): 1-4.
- [9] 刘云花, 黎泉. 微信健康类谣言的传播特征及治理对策分析[J]. 西部广播电视, 2024, 45(16): 83-86.
- [10] 郑新玲. 全媒体环境下网络谣言传播特点及主流媒体应对思考[J]. 记者摇篮, 2025(7): 75-77.
- [11] 梁雪.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农村老年人的社交媒体使用[J].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24, 15(4): 75-80.
- [12] 周绿璐. 休闲区隔: 中国居民休闲参与的社会分层机制及其代际差异研究[J]. 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5(6): 17-36.
- [13] 张思怡, 刘芳睿, 张颖航. 老年群体新媒体使用中遭虚假信息诱骗的发生机理与防范策略研究[J]. 科技传播, 2021, 13(20): 152-154.
- [14] 胡宏伟, 李悦, 余小豆. 失能失智老年人家庭照护社会支持体系: 历史演进、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J]. 社会保障研究, 2025(5): 3-16.
- [15] 闫萍, 郑璐颖, 陈知知. 数智技术何以应对老龄社会?——国际镜鉴与中国路径[J]. 智能社会研究, 2025, 4(4): 186-203+253.
- [16] 彭双杰. 互联网平台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应对[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7(5): 73-84.
- [17] 张春华, 蒋亦璐. 我国老年人数字素养现状与提升路径——基于系统文献综述的研究[J]. 成人教育, 2026, 46(3): 23-31.
- [18] 曹高辉, 董焕晴, 陈奕帆. 智慧养老背景下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框架构建与培育路径研究[J]. 情报学报, 2025, 44(8): 1031-1044.
- [19] 田益豪, 牟芳娇. 数字鸿沟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 CGSS 2021 的实证分析[J]. 科学·经济·社会, 2025, 43(2): 56-74+2.
- [20] 熊景维, 李文瀚. 老年数字鸿沟及其弥合机制: 基于技术歧视的视角[J]. 中国软科学, 2025(S1): 142-160.